

茶叶与鸦片如何影响了历史的走向(三)

片对进口鸦片的替代效应在186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1867年鸦片进口值达2230.4万两，而1868年仅为1853.7万两，下降了近17%。到1879年，全国鸦片的自给率达到80.12%。（《茶叶与鸦片》，第139—156页）1882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许士在贸易报告中声称，“外国鸦片不仅在华西和西南地区，而且在沿海地区也正在逐渐地让位于中国鸦片”，“中国鸦片终将把外国鸦片赶出中国，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仲伟民表示，“这可能是中国在19世纪的无数次商战中，唯一一次取得胜利的商战”，但这不过是“在用慢性自杀的方式来取得这场商战的胜利，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

更为重要的是，茶叶之于英国，鸦片之于中国，分别对两国社会起到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甜与权力》的作者西敏司曾指出，糖、可可、咖啡和茶叶等“瘾品”

，都有刺激性，“极适于纪律日益严格的枯燥乏味的日常工作”，其消费量的增加，“势必促使人们工作得更多、更紧张”，因而对近代欧洲的“勤勉革命”起了重要作用。相关研究表明，茶叶在促进英国的“勤勉革命”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突出地表现为改善了英国人的膳食结构。19世纪后期，英国劳动阶层一般要花费其食物总开支的10%用于茶叶和糖的消费，“茶叶以及面包和奶酪构成日常饮食的核心部分”。

英国学者麦克法兰指出，茶和糖的美妙结合，使千百万穷苦人在从事沉重且单调乏味的工作中能保持较为充沛的精力，“如果没有茶叶，大英帝国和英国工业化就不会出现”。而在中国，弛禁鸦片并大规模种植，使得19世纪吸食鸦片的人越来越多。据仲伟民估算，19世纪后期中国的鸦片吸食人数大约

在200万左右，占总人口的4%—5%，其中吸食上瘾者估计有300万至500万人。（《茶叶与鸦片》，第213页）从沿海到内地，从南方到北方，从城市到乡村，从经济较发达地区到边远贫困地区，到处都有吸食鸦片者。这些鸦片吸食者，不分男女老幼，也不论贫富贵贱，在很多普通家庭，烟具都是必备物品。鸦片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身体健康，使得中国人成为世人眼中的“东亚病夫”。

三、国家力量

《茶叶与鸦片》一书认为，中国近代茶叶贸易由盛转衰的首要原因，在于中国茶叶生产和管理方式的落后。中国是家庭副业的小农生产模式，而印度是大规模的种植园生产模式。在中国，茶树一般种植于山坡、屋旁、田边等“畸零之土地”。茶叶采摘基本依靠家庭成员，采摘时间参差不齐，叶子老嫩齐采，不分等级。茶

叶后期加工主要依赖手工，不仅浪费人力、效率低下，而且品质没有保障。在印度，英国人将茶叶种植园选在土地肥沃的大河冲击地带，对茶叶生产的各道工序进行科学实验，不断改良茶种。对茶叶采摘的时间和等级进行严格管控，如阿萨姆茶园规定采茶工清晨入园，采至11点钟止，每人只采同一等级的茶叶；每次采摘后，须经两周才能再采，这样每年可以采摘16轮。茶叶后期加工很快就实现了机械化，不仅速度快、成本大大降低，而且茶叶质量大大提高。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几乎每一磅印度茶都是上品，其制造方法在质和量方面年年都有改进”。两相对比，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命运可想而知。当时便有人指出，“印度对中国的优势，就是制造商（工业家）对手工业者的优势”，“控制着伦敦市场的正是这些拥有充足资本、改良的机器及专家监督的大茶园；而在湖北山边有着两三亩地的小农，是不能希望和它们竞争的”。

无疑，这个解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然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何印度可以采取大规模的种植园生产模式？具有典范意义的种植园模式，是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强占了大量土地后创造出来的，他

们在大片土地上种植单一经济作物，如甘蔗、咖啡、棉花等，劳动力则是来自于非洲的黑人奴隶。印度的茶叶种植园，是美洲种植园经济的升级版。麦克法兰指出，茶叶种植园的经营体系是一个金字塔结构，英国政府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因为它是阿萨姆邦的“所有者”，有权将土地授予任何想要的人。当然，能够拿到土地的几乎都是欧洲人。英国政府之下是茶叶公司，这些茶叶公司像东印度公司一样，由众多商人集股而成，如成立于1839年的阿萨姆公司首期入股资金达12.5万英镑。184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将三分之二的试点茶园移交给阿萨姆公司，租期十年，租金为零。茶叶公司招聘一些欧洲年轻人前往茶园担任经理，领取固定薪水，并从茶园发出的每一批茶叶中收取佣金。金字塔的最底层是成千上万的“苦力”，由专业的“招工机构”在印度各地市场购买而来。在茶园经理眼中，“苦力是会干活的动物，没有选择权，没有个人需求”

（《绿色黄金：茶叶帝国》，第176—199页）。不难发现，英国人打造出来的茶叶种植园经济体系，是建立在对印度土地、劳动力的无偿掠夺上。**未完 下期待续**
原创 冯志阳 中华读书报



本文提及的几本经典全球史著作